



星加坡文藝研究會成立典禮

致詞者為該會會長蔡崇語

在座者右起第一人為痲弦、第二人為劉以鬯、第三人為楊松年、第六人為白先勇、第七人為方北方。

香港的文學活動 劉以鬯

本人被邀在這個國際性的文學研討會上講話，深感榮幸。主辦當局出給我的題目，範圍似乎廣了些，在二十五分鐘之內，不容易講得清楚。我只能向各位作一個扼要的報告。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大部分香港人對文學都不感興趣。我說「大部分」，因為小部分香港人對文學還是有興趣的。雖然難以排除的阻力令人懷疑香港這塊壤土是否適宜文學花朵的成長；事實告訴我們幾十年來，一直有人在艱苦地從事嚴肅的文學工作。

談香港的文學活動，一九四九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陸作家如茅盾、戴望舒、葉靈鳳、馮亦代、端木蕻良、蕭紅、駱賓基、穆時英、臧克家、黃藥眠、司馬文森、柯靈等都在香港住過。魯迅、巴金、郭沫若也曾到過香港。但是，正在研究香港文學的小思認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確是沒有『香港文學』這個概念存在的。」換句話說，「香港文學」這個概念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才存在的。

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或在香港土生的文學工作者都寫了表現香港的作品，在作品中顯露對香港的關心。儘管困難很多、阻力很大，文學活動却從未停頓過。中大文社《當勢》座談會

資料冊中的《主要文藝雜誌年表初編》是一份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即使不夠全面，也足以說明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工作者的工作情況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文藝刊物為數不能算少，只是易於夭折。香港的文學工作者似乎都有一份可愛的固執，在缺乏有利條件的環境中，「此伏」仍有「彼起」，「前仆」仍有「後繼」，總不肯將失敗當作事實來接受。

香港辦文藝刊物，除了勇氣外，還需要一股傻勁。要解釋這一點，《詩風》也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詩風》是雙月刊，現在已出到第九十五期。在香港，這樣長壽的文藝刊物是很少的。它是疾風中的勁草。不過，你要是因此認為《詩風》已被香港人接受的話，那就錯了。據熟悉《詩風》的人告訴我，《詩風》銷數最多的時候，每期銷三、四百本；現在的情形更差，有時銷百幾本，有時一百本也不到。一本雜誌每期只能銷一百本左右，當然是十分可悲的。不過，香港就有這樣一種單靠傻勁而不怕虧本的雜誌。

不怕虧本的雜誌終究不多。辦了七年多的《海洋文藝》，因「銷行阻滯，虧蝕良多」，在去年十月停刊了。兩個月後，提倡讀書的《開卷》也「因銷數不夠理想，成本日益增加，虧損良多，難以支持」而停刊。這兩本文藝雜誌的停刊，對大多數的香港人來說，絕對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新加坡剛剛成立的「新加坡文藝研究會」主辦了一個國際文學座談會，邀請來自美國、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文藝界傑出人士，主講有關各地區的華文文學活動情況，交流彼此的經驗。應邀參加座談會的講員有：白先勇（美國）、痲弦（台灣）、劉以鬯（香港）、方北方（馬來西亞）、黃東平（印尼），以及「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的代表。

本刊榮獲劉以鬯先生及「新加坡文藝研究會」代表楊松年博士的原稿講詞。劉以鬯先生是我們熟悉的資深著名小說家、副刊編輯；最近主編出版一套「中國新文學叢書」，更完成一部中篇小說「猶豫」，創作力極盛。楊松年博士是「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的會長，主編「新加坡文藝」季刊；他的講詞，因為時間關係，在會上並沒有宣讀，將同時在「新加坡文藝」發表。兩篇報告，勾勒出兩地文學活動的現況，有助我們的了解。（編者）

《海洋文藝》停刊後，曾多次流傳某人或某出版公司正在籌備出版新的文藝雜誌；但是，樓梯響了幾個月，始終不見人下來。

目前，香港除了銷數不過一百左右的《詩風》外，已無定期出版的文藝刊物。《八方》是不定期刊，編得雖好，銷數却不多，除非在經濟上獲得有力的支持，否則，很難維持下去。《香港文學》是幾個青年合力辦的雜誌，力量薄弱，脫期已久，不知道是否能夠繼續出版。《羅盤》已停，聽說有幾個年輕人仍想搞下去，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本年九月間可能再出。《素葉文學》創刊號於去年六月出版，第二期直到現在還沒有問世。該刊負責人告訴我：第二期將於四月出版，顯然也在苦撐中。至於《青年文學》也很久沒有消息了，據說：「客觀環境的困難使今屆籌委會不得不謹慎從事。」（《籌委會總報告》）

在這種情形下，作家寫成作品後想找發表的地方就會發生困難。去年，在《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上，有人問舒巷城「目前文藝雜誌這樣少，你寫了文章會找不到地方發表嗎？」舒巷城答：「如果有文章的話，拿給胡菊人在《中報月刊》上發表，相信他不會不登的。」

這就說明了現階段香港文學最可悲的

一面。由於「客觀環境的困難」，使文學刊物多數陷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文學爲了求生存，不得不依附綜合性雜誌。更可悲的是，現在有些綜合性雜誌，知道大多數讀者對文學不感興趣，爲了避免銷數下降，決定削減刊登文學作品的篇幅。

綜合性雜誌削減刊登文學作品的篇幅，使文學工作者只好將希望寄存在報章上。報章對文學的推動是應該有一些力量的，但是，絕大多數的香港報紙都排除文學作品。香港每天出版的報紙達幾十種之多，願意刊登嚴肅文學作品的，少之又少。目前，只有兩份報紙關有文藝版，《新晚報》的《星海》版，每週發刊一次；《文匯報》的《文藝》版，每半個月發刊一次。兩種副刊雖然也登本地作家的作品，數量不多。

至於香港出版商所走的路向，對文學工作者也是沒有甚麼鼓勵的。香港出版界有一句流行語：「文學作品是出版界的毒藥。」因此，嚴肅的文學作品想在香港找到出版的機會，並不容易。香港作家的作品在外地出版的，爲數倒不少，隨便舉兩個例子。《香港小說選》是在福建出版的，《大拇指小說選》則在台灣出版的。不過，這不是說香港的出版商就不出文學書籍了。有一個時期，靠複印機弄出來的翻版書充斥書市。現在，情形已有顯著的改變，部分出版社也願意規規矩矩出些新文學的書籍了。《香港文學研究社》除繼續出版《中國現代文選叢書》外，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叢書》。《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茅盾的《鍛煉》與《脫險雜記》，艾青的《抒情詩一百首》、沈從文的《從文散文選》等。三聯書店除出版《回憶與隨想文叢》外，還在計劃出版《現代中國作家叢書五十種》與《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昭明出版社》出版了《柯靈選集》、《巴金選集》與《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等。此外，《素葉出版社》的《素葉文學叢書》第九至第十二種，最近已出版。

明知不可爲而爲，在一般不喜歡文學的人看起來，當然是很傻的。但在香港，既有一些人願意在無利可圖的情形下爲文學做一些「傻」事。前幾天，香港有一家「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了。這是一家「以發掘寫作人材，推動讀書風氣爲目標」的出版公司，已開始公開徵求創作小說。

事實上，不僅少數出版商肯爲文學盡一點力，像市政局、港大、中大學生會與理工學院學生會，雖然遭遇的困難相當多

，也在披荆斬棘，爲香港社會做着播種子的工作。市政局爲了「鼓勵市民對文藝寫作之興趣，藉以提高一般文化水準」，於一九七九年舉辦了《中文文學週》與《中文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了，除《文學獎》外，八月將舉行《文學週》。港大、中大學生會聯合舉辦的《青年文學獎》，今年是第八屆。第七屆的《文集》上月已出版，從集中的得獎作品來看，香港年輕一代的寫作水平相當高。此外，《青年文學獎籌委會》還辦了一些推廣性的活動，諸如「文學生活營」、「寫作班」、「文學講座」、「電台節目」、「青年文社」、「中學巡訪」之類。……理工學院每年也舉辦一次「理工文藝創作比賽」，範圍較小，參加者只限於校內的同學。

在過去的兩年中，經中國大陸到香港來的作家有好幾位。蕭乾、畢朔望、卞之琳、馮亦代、秦牧、陳殘雲、黃慶雲、吳紫風、艾青、王蒙等都曾在香港公開演講並參加座談會。聽說中文大學正在籌劃舉辦《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將邀請各地作家來港參加。

從這些事實來看，雖然香港文學活動的推展經常遭受阻力，搞文學的人還是有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明知改變社會風氣之不易，却願意以薄弱的力量去克服重重的困難，爲文學做一點事。《大拇指》在極艱苦的情況中出版了五年，現在仍在出下去。《素葉出版社》的成立，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許迪鏘與周國偉在接受《理工學生報》文藝版專輯組的訪問時，坦率說出了籌集資金的情形。

「我們是以儲蓄的方法來籌集資金的，在照顧生活的必需以外，每人按月都贖出一點錢來儲起。儲夠了一個數目，便拿來出版一輯書。」

《素葉出版社》用這種方法出版的文學作品，已有十二本。上月出版的四本中，有一本是吳煦斌的《牛》。《牛》的出版，是香港文壇的一件大事。它不但用事實反擊了「香港沒有文學」的謬論，還使所有對香港文學失去信心的人重獲信心。

除了吳煦斌，在寂寞地、不斷地做着智力勞動的文學工作者如胡菊人、李維陵、也斯、西西、何福仁等都已取得相當好的成績，是必須加以重視的。對於香港的文學工作者，路太窄，不成問題，只要有路，總是可以走的。在我離港來星的前一天，《港大文社》寄了一本新出版的文藝雜誌給我。這本文藝雜誌叫做《新火》。